

产业变革背景下新主流电影叙事策略创新

■文/马 巍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民众消费习惯发生明显转变,除了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消费外,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需求日益旺盛,推动国内电影产业飞速发展,助力中国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在这一产业变革背景下,需要重点解决“主旋律电影”与“主流电影”之间的脱节问题。业界人士主张将“两大主流”,即主流价值和主流市场相结合,形成新主流电影。整体而言,新主流电影表述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国家为人人、人人爱国家”的主流价值理念。以多样化主旋律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主流意识形态、彰显良好国家形象。如此,新主流电影恰好适应国内产业变革趋势,更易被观众认可与接受。现阶段,新主流电影已成为市场主流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新主流电影属于与主流价值观、主流市场相适应的主流文化产品,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价值引导、凝聚社会共识、强化方向感的积极作用,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当然,微观层面主要得益于新主流电影的叙事策略不断创新,整体叙事视角平民化、叙事内容兼容国际与本土言说、叙事风格多样化。

叙事视角平民化,创新现实主义创作模式

产业变革背景下,新主流电影彻底脱离“非黑即白”“高大全”的脸谱化人物形象塑造,不再刻画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伟人”形象,如焦裕禄等,而是聚焦普通人视角,塑造有血有肉、接地气的多元化普通人物形象。例如,电影《涓天河行动》中的缉毒警察高刚,在各种办案场景中始终儒雅睿智、身手不凡;作为一名警察,高刚鞠躬尽瘁,尽心竭力。在现实生活中,高刚与妻子“婚姻破裂”,用照片缓解对女儿的思念之情,极易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通过颠覆概念化、脸谱化的叙事模式,赋予新主流电影以更高的社会价值。再如,“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我和我的父辈》,虽然边界不断缩小,但人物形象不断丰富、人物内涵逐渐丰满。尤其《我和我的家乡》中叙述各行各业普通人的生活,从教师、乡村干部、司机等不同视角,带领观众感受生活百态,包括不同职业的责任、小市民的精明、异乡人的淳朴等,使观众以强烈代入感了解个人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个人发展与祖国发展之间的对接。《我和我的父辈》聚焦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将不同时代下的“父辈”作为叙事主体,诠释“父辈”角色承载的现实意义。

叙事内容兼容国际与本土文化言说,契合“走出去”文化战略

产业变革背景下,新主流电影创作者应结合全球化进程加速的现实,创作一、兼具本土文化基因和国际言说方式的电影作品。一方面,新主流电影创作者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在学习好莱坞电影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分析西方文化他者化的叙说方式,建构中国特色的电影言说方式、话语体制,引导主流电影受众对中国形象的期待视野,帮助受众逐步摆脱西方语境下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新主流电影依据中国文化、现实语境、民族特色,发掘对历史和现实的观照角度,明确能够代表我国形象的故事素材和艺术表达,尽可能尝试本土化改造,多元化阐释主流价值理念内容。例如,《长津湖》《金刚川》等新主流电影通过阐释不同国家尊重公民个体生命的共识,通过展示普通英雄人物热爱小家,但是面对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的选择时,选择牺牲小我、保卫国家,向观众传递以人为本主义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念,能够引发国内内容强烈的情感共鸣,以电影叙事内容吸引更广泛的受众群体。《流浪地球》《红海行动》等新主流电影将中国故事升级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使得叙事内容以考虑全人类共同利益为起点,加之群像式的英雄人物、集体主义价值取向、饱和式的拯救策略等丰富内容,穿插西方个人英雄

中外电影融入外语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文/王朵朵

外语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升、品格塑造为育人目标,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举措之一。立德树人本身涵盖中国文化、时代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世界优秀文化等。需要注意的是,外语课程思政并非将思政简单嵌入外语教学环节,而是需要教师、教学环境、教材、学生等相得益彰,实现外语和思政的内外联动,帮助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辩证看待不同文化,能够全面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经过外语课程思政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发现,相比于外语教材等文字资料,中外电影更加生动、直观、立体,且中外电影反映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兼具政治性、艺术性等特点。将中外电影融入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能够充分调动大学生多感官参与外语学习。当务之急,高校外语教师应发掘中外电影的传统文化教育、价值观教育、跨文化交际等教育性功能,打造良好的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新生态,借助中外电影优化教学设计,完善教学评估,促进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时俱进。

营造外语课程思政教育“人文环境”,强化爱国主义教育

课程思政教育环境直接影响着高校思政教育整体质量。高校外语课程思政教育环境的塑造,一方面需要外语教师与党组织、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需要高校党组织等部门牵头,组织外语学院、思政教育学院、艺术学院等院系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发掘将中外电影融入外语课程思政教学中的优势。事实上,中外电影史包括中国和外国电影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艺术运动和艺术思潮、重要的电影艺术家和代表性作品,能够为思政教育、课程思政教学提供新的视角和灵感。

高校有必要组织艺术专业教师,为外语教师提供关于中外电影史知识的专业培训,定期进行考核,促使外语教师能够从海量电影中选择适合融入外

语课堂的电影素材,进而提升外语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新颖性。如此,外语专业教师人文素养提升,积极响应国家“将思政课程与各类课程协同”的号召,自然能够协同思政等专业教师,共同营造良好的外语课程思政教育“人文环境”。基于此,外语教师将中外电影划分为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民族意识、情感表达、道德修养等不同主题、阶段性组织学生集体观影,轮流观看中外电影,形成对比教育的环境。

例如,外语教师与思政教师联合组织学生观看《战狼2》和《敦刻尔克》,让学生感受中式和英式爱国主义的不同;观影之后,外语教师组织学生参与围绕“爱国主义、战争、个人与社会价值”等不同主题的外语演讲大赛,或者观影后交流会,打造师生广泛参与的外语课程思政教学生态圈。在此过程中,高校学生将爱国主义情感融入演讲或者互动交流中,将外语学习与爱国密切结合,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实现外语口语水平的显著提升,充分发挥中外电影在外语课程思政教学中的积极“助推器”作用。

灵活选用案例教学法等手段,优化教学设计

外语教师作为外语课程思政教学的主导者,应不断更新思政理论知识,具备精准辨析外语教学中不良政治渗透的能力;从思政育人视角出发,提取恰当的中外电影史理论知识,正确发掘中外电影中的课程思政元素。以此为切入点,外语教师综合运用案例教学法、任务式教学法等,不断优化教学设计。

例如,针对英语课程思政教学中的“体育生活”主题,教师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即让学生充分领会中西方体育精神,提升学生对中西方文化的认知水平,在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具备运用英语等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据此,教师选择《夺冠》和《百万美元宝贝》中外电影作为案例,让学生领略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体育故事,感受奥

主义的反面镜像内容,向国内外受众传达中国电影的主体性表达内容。通过整合传统与当下、历史与现实、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契合点,新主流电影启发观众反思现实,逐步消解好莱坞电影、西方文化等对中国受众的规划,为中国电影“走出去”奠定内容基础。

叙事风格多样化,打开新主流电影发展市场

产业变革背景下,新主流电影叙事风格更加多样化,即采用不同方式讲述故事,在创新我国电影叙事风格的同时,提升电影趣味性。同时,随着我国电影产业改革升级,电影工业化程度整体提升,新主流电影作为我国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实践成果的定位更加突出,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多种类型电影元素进行对接,灵活运用类型化叙事策略或集锦式叙事结构,兼顾市场和受众。一方面,新主流电影实施类型化叙事策略,结合电影工业美学特征,以市场和商业为导向,使得叙事节奏和故事衔接整体较为和谐,实现商业与口碑双赢。例如,《战狼2》《红海行动》融合战争、灾难、军事、动作等元素,增强新主流电影叙事张力,适当借鉴好莱坞商业大片叙事模式,在视听、节奏、情节等各方面彰显中国军人形象。另一方面,新主流电影实施集锦式叙事策略,为迎合新媒体时代观众更加青睐“短平快”叙事节奏的品味,综合考虑受众情感差异和面对不同主题短片时的“适应性”,以较强的逻辑性将电影各个模块进行衔接。例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系列电影,皆由多位导演执导不同的单元故事,共同围绕同一核心线索,使得电影空间场景转换自如,能够充分满足受众的多元化审美期待,为新主流电影发展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项目基金:2023年吉林省高教科研课题《高校传媒专业“专创融合”助力吉林省文旅行业数字化发展策略研究》(项目编号:JGJX2023D906)阶段性研究成果。

运精神、女排精神,以及西方拳击精神。同时,外语教师可以根据电影案例,设计不同的外语课程思政教学任务,将学生分为不同小组,布置两次英语口语汇报任务。第一次任务,各小组学生结合电影,展示搜集到的中西方体育文化异同相关资料;第二次任务,各小组学生先介绍奥运精神,选择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太极拳、功夫、武术、或者西方体育项目足球、篮球等进行详细讲解,并结合电影进行文化内涵的延伸讲解,为学生表达外语知识与思政知识提供足够的机会,为教师调整教学设计提供依据。

创新教学评估,提升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效率

中外电影融入外语课程思政教学,其主要目标之一在于激发学生外语学习热情。现阶段,乃至未来很长时间内,不同专业学生学习外语的需求和诉求更加多样化,亟需高校和教师创新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评估,改变长久以来将成绩作为唯一或者最主要评价指标的评价方式。积极落实问卷调查、数字化评估、对话访谈等过程性评价方式,深入了解不同学生或学生不同阶段的需求,综合评估学生的道德修养、文化素养、心理活动、知识储备、未来规划等,以保障对学生评价的全面性、客观性、准确性。当然,外语教师可以借助中外电影经典片段,结合新媒体等技术营造沉浸式评估场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外文化背景下不同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等思政教育相关元素融入其中,让学生通过“人机对话”,用外语回答画面中问题的方式,客观评估学生学习外语课程思政的情况,逐步推进外语课程思政教育整体改革。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23年度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习近平爱国主义教育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3JK0094)、陕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2023年度课题:《高校思政类微信公众号的建设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课题批准号:SGH23Q0313)的研究成果。

校园、家庭与社会:青春题材电视剧的多元聚焦

■文/万平 吕佳音

作为中国电视剧的流行创作类型,青春题材电视剧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丰富多彩青春画卷,是时代经历与文化想象的交融结晶。此类剧集以社会文化积淀为根基,构建了一个契合社会文化心理范式的虚拟世界,使剧情及人物关系遵循特定的文化规律发展,为社会热点问题提供了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本文以新世纪以来具有一定热度的青春题材电视剧为研究蓝本,分析该题材电视剧对现实的镜像作用及其彰显的社会文化风范。

一、校园:聚焦青春症候,建构两性关系

青春题材电视剧全面展现了在该场域中青少年学生的成长历程,一方面,青春题材电视剧将校园打造成为世外桃源般的存在,阐明纯净的校园空间成为青春美好记忆的载体,彰显青春的懵懂与单纯。其中,对青春两性关系的建构成为该题材影视剧的一大创作重点。如电视剧《小欢喜》里黄芷陶和季杨杨之间点滴的细腻情感一直为广大观众所喜爱,这份青春期朦胧的情感都是自然而然地“发脾气、止乎礼”,有着难得的纯粹。而《致青春》则更多地与现实接轨,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线更具现实意味,也更体现真实的人性。女主人公邓薇与林静的情感线受到了上一辈情感纠葛的制约,而她和陈孝正的感情,一整个美好的大学时光最后止于职业生涯规划的不一,爱情和学业、爱情和工作成为了如今众多校园情侣在毕业时不得不思考的难题。恰恰是因为这类问题没有正确答案,它们终将成为青年一代成长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另一方面,青春题材电视剧没有掩盖压抑、破败的氛围,“校园空间成为青春主体另一个企图逃离的场域,在这里仍旧寻找不到失去的温暖与迷失的自我”。该题材电视剧聚焦青春症候,剧中表现的青春时期的年少轻狂与叛逆,在校园环境中常常受到应有的惩戒。这些情节不仅揭示了青春一代在步入成人社会之前,对现实生活的预先

体验,对于观众群体而言也不失为一种警醒和反思。如《十七岁不哭》中的罗洋,即被塑造成为“小人得志”的形象,他是社会中那些个阿谀奉承、阴险狡诈之人的缩影,这一角色的是对青春心理的描摹,以吸引更多目光共同关注青春成长症候。

二、家庭:关注代际冲突,碰撞教育理念

“家”在青春题材电视剧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场域和不可或缺的叙事空间。在这一空间中,青春题材电视剧充分展现了代际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青年男女的倔强反叛。如电视剧《奋斗》中陆涛一角既反感养父为人处世的原则,也不认同生父从商的理念,因此他毅然决然地踏上反叛的道路,用自己的方式践行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再如《我的青春谁做主》中李霹雳说道:“不是父母认为的理想就是理想,理想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只是没有实现我妈的理想,并不代表我的理想就一样没价值……父母的经验是很宝贵,但是仅供参考。”由于不同的成长环境和不同的价值理念,两代人之间不可避免会产生代沟,但青春题材电视剧借此传达出一种理念:两代人之间应当学会互相尊重,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展开平等的对话。

此外,青春题材电视剧还呈现了不同家庭的不同教育模式,从而引起了观众的积极思考和热烈讨论。如在《小欢喜》中立体式地呈现了多种类型的家庭教育模式:英子家的专制型家庭教育模式,虽然保证了她在学业上的优异,但却忽视了孩子心理需求的满足,导致英子在面对压力时产生焦虑和抑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方一凡家,民主型的家庭教育模式使得方一凡在宽松的环境中自由成长,他的性格开朗、独立,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困境。而季杨杨家,由于父母的长期缺席,使他倍感孤独,形成叛逆的性格,这种家庭教育模式对他的人生产生了负面影响。电视剧将不同的家庭教育模式生动地

类型融合·期待视野·符号隐喻

——电影《无名》的审美特性

■文/赵丹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主旋律电影不断追求创新与超越,将思想性、艺术性、商业性嵌入爱国主义、家国情怀主题,走出了类型融合的新路径。作为一部融主旋律、谍战、商业类型于一体的电影,《无名》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审美情趣,为主旋律电影创新发展提供了启示,是一次不落类型窠臼的崭新尝试。

类型融合:主旋律与谍战悬疑的成功嫁接

在当下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过程中,类型的融合与杂糅已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而这种发展趋势对电影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一方面要熟悉和把握各种类型片的基本特征与创作规律,另一方面则要敢于打破传统模式的束缚,以富有新意的艺术探索 and 多元化的艺术形态,在交叉融合与相互渗透中展现新的审美风貌,进而适应广大观众不断变化的审美需求。

电影《无名》通过对奋斗在“孤岛”时期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共特科,在隐蔽战线与各方势力殊死较量过程的再现,礼赞了党的秘密战线上那些无名英雄们的重要贡献。导演将错综复杂的故事及人物设置在20世纪30、40年代那个波谲云诡的时期,以日军空袭广州、上海沦陷、汪精卫叛国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节点,全景式地呈现1937—1945年的时代背景。《无名》以非线性叙事方式打破时间线索,重新组接历史时空中的重要段落,进而展现中共、军统、日伪等特工人物的命运发展和周遭环境形势的变化,营造出紧张悬疑的氛围感。在矛盾冲突中,中共特工在谍海风云中体现出的机智勇敢、沉着冷静、勇于奉献和牺牲的精神是电影表达的主旨。《无名》通过对“信仰”“奉献”“牺牲”等主流价值的表述,适应了当前的社会心理和主流观众的欣赏口味,在类型内部完成了对社会道德和信仰的重塑。主旋律与谍战悬疑的成功杂糅

成为电影商业与艺术双赢的有效途径。期待视野:主流召唤与受众期待的双向奔赴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的全面推进,主旋律电影在承载意识形态宣教功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其文化商品属性,努力将意识形态性与艺术性、商业性结合,以此推动电影为更多观众所接受。一方面,主旋律电影因其意识形态特性,“对建构的主体/观众寄予了包含着民族国家、政治文化想象在内的认同预期”。主旋律电影的精神主旨是赞颂、颂扬中国英雄、中国精神,电影的内容情感契合广大观众的爱国热情,让观众在观影中激发对国家的、对时代的敬意,于潜移默化中凝聚培根铸魂的正能量。而电影只有通过观众接受意识的传递,才能使“为他之物”成为“自在之物”,实现其预期的意识形态价值、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

另一方面,主旋律电影要满足观众的感性欲望,达到释放观众情感的目的,让观众在审美经验和接受心理在观影过程中得以呈现。《无名》展现的时代背景及故事内容,正是中华民族饱受战争侵略的血泪历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无数人前赴后继的“无名”英雄,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展示了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而观众通过与影片中人物的认同,投射着他们的勇气、智慧,实现他们的光荣与梦想,释放着他们的自信与自豪。电影在满足观众个人无意识欲望的同时,也唤醒了“国仇家恨”的集体共鸣,使人类本质的丰富性得到无限的延伸。

符号隐喻:文化认同与时代精神的美学呈现

《无名》借引艺术符号,通过意象叙事,重塑观众的集体记忆,激发观众的历史家国情怀,进而深切地感受到电影的内涵。

展现在观众面前,让人们深入探讨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引发了观众对教育的深思。

三、社会:折射生存境遇,反映现实热点

青春题材电视剧也多聚焦职场与生活空间,将青春的奋斗场所铺展到社会各个层面,提炼出不同社会空间中青年人的精神风貌,也揭露出发人深省的现实的生存困境。如赵宝刚执导的“青春三部曲”《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北京青年》,描写了一群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或为了生活或为了理想努力奋斗的艰辛过程。这类电视剧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得恰到好处,为当下同样正在努力奋斗的年轻人提供了生活和情感上的寄托。又如《欢乐颂》讲述了五个来自不同家庭、性格迥异的女孩在残酷的社会环境下共同成长的故事。精英女性安迪,业务一流却饱受精神困扰;“富二代”曲筱绡,物质条件优越,却难以受到家人认可,三个普通女孩樊胜美、邱莹莹、关雎尔,分别为家庭、爱情、工作等困扰。电视剧通过生动描绘这五位女孩的生活琐事和心路历程,展示了当代女性在步入社会后所面临的种种压力与挑战,以及在不断尝试、摸索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再如《正青春》以严谨的视角关注女性群体在激烈职场中的处境。在剧中,各个女性角色为追求职场成功,纷纷投身于名与利、得与失、成与败的角逐。她们奋力拼搏,展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该剧以女性视角为主线,为观众呈现了一幅生动的女性职场画卷。

青春题材电视剧自20世纪末进入大众视野以来,现已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大众审美的独特风格。青春题材电视剧关注青春一代的奋斗经历和生活状况,真实再现年轻人前行道路上面临的纷繁问题,可为现实中面临抉择的年轻人提供有效的参考。(万平系吉林学院教授,吕佳音系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

电影开篇,两只狗的境遇对比便形成了极大的情感张力。高空的飞机上,日军飞行员的爱犬“罗斯福”头戴航空帽、护目镜,神态高傲,仿佛“总统”在巡视领土。镜头俯视,飞机下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废墟一片。一只瘸腿小狗,骨瘦如柴,呜咽不断,艰难地寻找避难所而不得。狗的命运恰是人的命运的折射,动荡年代人不如狗,狗不如狗。侵略者的嚣张与国人的无助,通过电影镜头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苦难的历史记忆被再次唤醒,民族精神血脉得以赓续。电影中另一个动物羊也是激发情感的重要意象。羊出现之前,电影呈现的是一组非常惨烈的镜头。被困在井底的工人仰头向上,眼中冒出求生的欲望,却被敌人用水泥活埋。镜头一转,一只洁白的羊站在光影中,如地獄中救赎的天使。但下一秒,羊变成了侵略者的一锅肉,乍然的毁灭感令观众的愤怒情绪瞬间引爆。

电影最具有隐喻性的则是片名《无名》。“无名”,即名字的模糊化、符号化。在电影中,何主任、叶秘书、陈小姐……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具体完整的名字,抹消了个体的独特痕迹,使其具有了群体的意涵和指代性。他们衣冠楚楚,精通外语,揣度人心;他们高贵光鲜,像炼狱中的刺芒,常常凭一己之力撼动各方;他们手染血腥,不惜牺牲自我和战友来争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导演用他们的矛盾与孤独、痛苦与挣扎重塑“无名”精神。片名符号清晰、准确地传达了电影的主题内涵,即对无数革命先辈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但直到献出宝贵生命的那一刻,他们都没有名字的“无名”精神的礼赞。

《无名》是一部在艺术性与主旋律之间探索探寻的商业电影。虽然在类型杂糅中略显生疏,但《无名》在主旋律电影艺术创新方面的大胆尝试,必然激发主旋律电影的全新创作状态。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独立学院开展经典教育的路径与方法研究”(项目编号:GH181057)阶段性成果。

《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声屏世界》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是全国广播影视十佳学术期刊,荣获“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年)”称号。《声屏世界》1988年创刊,全国公开发行人。

国内统一刊号:CN36-1149/G2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3366
投稿邮箱:jxspsj@163.com jxspsj@126.com
电话:0791-85861504 0791-88316904



广告